

《布尔塞维克》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研究

李曜容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摘要:《布尔塞维克》作为中共理论性机关刊物,广泛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尤其是瞿秋白与蔡和森担任主编期间,格外重视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瞿秋白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的时间为1927年10月至1928年6月,共主编23期,蔡和森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的时间为1928年7月至1928年10月,共主编5期。瞿蔡主编下的《布尔塞维克》时代风格鲜明,农民运动的报道范围覆盖全国,报道采取具体情况与政策理论相结合的方式。

关键词:《布尔塞维克》;农民运动;农民协会

A study on the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Bolsevik

Yaorong 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0

Abstract: As the theoretical pub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Bolshevik" extensively documented the worker and peasant move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editorship of Qu Qiubai and Cai Hesen, a strong emphasis was plac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Qu Qiubai served as the chief editor of "Bolshevik" from October 1927 to June 1928, co-editing a total of 23 issues. Cai Hesen took over as chief editor from July 1928 to October 1928, co-editing five issues. The era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Qu and Cai had a distinct style, with coverage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spanning the entire nation. The reporting approach combined specific circumstances with policy theory.

Keywords: Bolsheviks; Peasant Movement; Peasant Associations

引言:

国内农民运动的报道更加注重南方农民运动工作,宣传中共的农村革命成果,贯彻实施土地革命的政策,总结革命经验并即时更正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党内理论思想学习;北方农民运动的报道更加注重鼓动农民群众投身阶级斗争的洪流,唤起北方农民的阶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中共农村政策的宣传。

一、《布尔塞维克》与农民运动

《布尔塞维克》所载农民运动的报道按地域可划分为北方农民运动、南方农民运动、国外农民运动。北方农民运动详见《山东直隶之大灾荒》《如火如荼的奉天农民暴动》《河南工农的反冯战争》《东昌农民的暴动及其发展的趋势》等文。北方农民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为自发的民间组织,且带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迷信色彩。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势力薄弱,支部组织数量少,土地革命等相关政策宣传乏力。此类文章重在号召农民群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展有组织、有纪律的科学斗争。

《布尔塞维克》关于南方农民运动的言论众多,广泛报道了中共重点开展农民运动的区域,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江西等的农民斗争。北伐战争时期,北伐军所到之处便宣传共产主义,组织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转入低潮,但在地域上仍呈现出多点爆发的状态。《布尔塞维克》关注“朱毛”

基金项目: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斗争》东北地区通讯研究”(YJSCX2021-133HLJU)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曜容,性别:女,出生年月:1997年1月,民族:汉,籍贯:山西省忻州市,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在读硕士,单位: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与媒介史,邮编:150000,

红四军在湘赣边境的苏维埃武装割据情况，以政策解读实际情况。此类文章重在宣传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加强党内思想教育。此外还有较为特殊的朝鲜农民在东三省发起运动的报道，详见《走头无路之朝鲜农民》《今日之朝鲜》等文。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号召被压迫的民族、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压迫，宣扬共产主义思想。

二、《布尔塞维克》北方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

北方农民运动整体呈现出组织松散，缺乏系统性领导，且多数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特征。北方各地农村的农民组织包含红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这些自发的民间组织除了自身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之外，还受到来自国民党、军阀的利诱，其革命性与进步性有限。由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北方发展迟缓，势力较为弱小，无法在大范围之内公开地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革命。中共理论性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整合报道了直隶、山东、冀豫、满洲（东北）等地的农民斗争，呼吁有阶级意识的群众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指导中共北方局开展组织农民运动工作。

1. 北方农民运动的发展形势

北方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别于南方，整体发展相对南方落后。北方农村中的剥削阶级除了军阀买办、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地主外，出现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干预，导致北方农民群众的痛苦日甚，在多重阶级的强大压迫下农民运动发展迟滞。

(1) 北方农村中各阶级矛盾分析

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北方农民解放的最大阻力。广大北方地区长期受制于新旧军阀的高压统治，往往仅在一省之中政治局面就表现得四分五裂，大小军阀明争暗斗，这种政治斗争使得扩军备战之势更甚。军阀主要通过向农民苛捐杂税来补足军费，通过强制性征兵补足军队队伍。但在面对农民暴动时，他们又倾向于通力合作镇压暴动。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张作霖统治下的东北和直隶金融崩溃、纸币跌价，导致城市资产阶级与军阀沆瀣一气，加紧收买土地，开始农业大资本经营。

地主豪绅对农民群众的剥削最甚也最直接。地主豪绅将军阀下达的多种名目税捐转嫁给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往往需要为地主富农买单。为保障地主豪绅的利益，土豪劣绅组织了武力团防，雇佣地痞流氓、雇佣军、军队士兵以武力胁迫的方式收捐、征兵，从而完成军阀在一地农村中的统治。买办、重利盘剥者也是地主豪绅的同伙，与地主共同盘算剥削方式，分派剥削款项。

农村中广大自耕农破产。农民通过售卖农产品的收入已无力购买工业产品，艰难的生活迫使他们其中一部分成为城市苦力、工人。受灾荒影响的直隶山东，农民更是走投无路，一部分作了士兵，一部分成为流寇土匪。有革命意识的农民自发加入反抗军阀、地主的民间团体大刀会、红枪会等，但由于自发的民间团体自身没有组织性，缺乏科学的领导，在面对国民党与军阀的诱惑时，容易脱离革命性质转而投入反革命队伍中；具有阶级意识的民众革命势力弱，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

日本帝国主义在关东州的农业经营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为农业资本经营。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相互勾结，从而获得中国农村的土地经营权，使自耕农被迫破产而成为美国式奴隶。

(2) 北方农民运动组织分析

① 自发民间农民组织

《布尔塞维克》记载中，直隶、山东、河北、奉天（今辽宁省）、河南都广泛出现民间农民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天门会等。这些组织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军事斗争上，组织会众众多，他们的作战方式属于游击作战与正面冲突暴动相结合，军事技术具有“行动迅速而有统一性”，“团结力坚固，尤不怕死”，“严守秘密”，“有最新式武器”四类优点，但同时也具有“不摧灭地主豪绅，仍留着军阀的孽种”，组织形式大多松散这两类不利革命的特性。焦作农民群众通过开代表会的方式来讨论具体斗争方法，虽然也喊出了“打倒劣绅土豪地主”的口号，但这种组织形式没有形成系统性和稳固性。奉天、安东、宽甸等县的大刀会宣传共产，积极吸纳各县自卫团力量，发表打倒张作霖的宣言，提出建设农民自己的政权，但这个政权的性质并不科学，大多“迷信神权”，也“没有很明确的颁布革命的政纲”。经济上“不提出土地革命而只以乡村自治为建设目标”，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封建剥削制度。^[1]

② 共产党领导的豫南农民暴动

中共所领导的北方农民运动力量弱，涉及范围小。豫南农民成立农民革命军，接受中共领导，实行土地革命，确立建设农村苏维埃的旗帜，并带动确山、信阳等周边数县农军加入革命潮流。但由于豫南的革命力量无法与外界形成联络，其影响力也无法冲破地域的限制。

2. 《布尔塞维克》对北方农民运动宣传鼓动的具体形式

列宁曾对“宣传”与“鼓动”进行清晰的区分。他认为，“宣传”是运用文字性的工作对知识分子进行说服行为，主要介绍党内的理论体系；“鼓动”是针对普通群

众的煽动行为，基层组织的宣传人员运用口语媒介，以简单和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普通群众。从中可以看出，“宣传”与“鼓动”的主体不同，“宣传”的主体是党内知识分子，“鼓动”的主体是有革命性质的普通群众；使用的媒介不同，“宣传”以运用文字为主，“鼓动”以运用口头号召为主；传达的信息不同，“宣传”以介绍复杂的理论体系为主，“鼓动”所涉及的多数是简单化、具体化后的理论实际。

《布尔塞维克》以通信体裁刊载关于北方农民运动的文章，按照地域整合农运事件，以报道与言论相结合的论述形式阐明作者观点，对北方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布尔塞维克》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是为中共的方针政策所服务的。在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党中央提出争取在一县或数县取得革命政权，进而在一省率先成功，最后形成总暴动的局面。守愚在《河南工农的反冯战争》中明确阐述了其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将河南农民的斗争经历“介绍给各地的革命民众，知道河南境内，还有一枝土地革命军，与广东及长江流域的各地工农兵暴动，互相呼应”^[2]。

论述中共在北方农民运动中的角色。绮园在《如火如荼的奉天农民暴动》中作了如下言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只是努力将各处自发的农民暴动，加以缜密的组织周详的计划和英勇的领导”^[3]。中共在北方农民运动中的角色应当是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他的目的就是领导农民通过施行土地革命，推翻封建私有制度，建立工农的苏维埃政权。

使群众认识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前途。立夫在《山东直隶之大灾荒》中介绍了苏联政府强有力的预防与救济灾害的方式，加强了工农群众、党内同志对苏维埃政权的理解与信心。

三、《布尔塞维克》南方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

国共合作北伐使得共产党在南方的群众基础更坚实，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是中共开展农民运动的主要区域。在北伐的过程中，中共就强调在农民群众中宣传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的重要性，鼓动群众暴动推翻地主豪绅的农村经济剥削制度。北伐失败后，中共作出了以游击作战发展为群众暴动的革命路线转变，多数农民政权也转入地下活动状态。广州起义失败后，南方的农民运动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雏形，其中以湘赣边界的农村苏维埃政权最为典型。

1. 南方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

南方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与北方基本一致，但南方农

民运动又有异于北方农民运动。南方农民运动的领导力量归农民政权，如农民协会，从一开始这样的农民运动就在科学的政纲领导之下有组织地进行。中共早在北伐过程中就广泛地对农民群众施以影响力、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有机会农民就会主动起来推翻封建经济制度。南方的农民运动是中共登上革命历史舞台的重要一环。

2. 《布尔塞维克》与江苏农民运动

江苏的农民运动早在北伐战争时就受到共产主义影响，农民领袖及中共积极组织农民政权，积累了丰富的对军阀地主斗争经验。虽然在蒋介石入主江苏后农民政权被迫转入秘密状态，但也发展出了新的革命路线——以游击作战的策略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与革命斗争。

(1) 北伐前的江苏农民运动发展形势（1926年秋收-1927年4月）

北伐之前的农民暴动由中共及农民领袖牵头，鼓动农民群众参与各种形式的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游行示威，向地主豪绅发起进攻。岳威在《革命的江苏农民》中整合了江苏各地的农民运动情况。江苏各地蜂拥出现多种形式的农民政权。松江、漕柘两乡成立农民自救会，等同于区农协，各码头又组织码头会，等同于村农协，二者共同选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丹阳、吕城在北伐军到来后，农民主动要求组织农协，遂成立农民促进会；崇明农民在1926年秋收时组织农民协会抗租减租；江阴农民组织裁判委员会和农民协会。

农民政权对农民暴动起到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江阴码头张贴“拥护农民自救会”，“反对剥削农民的惠民公司”等标语；宜兴农民1926年双十节当日组织群众大会，提出“打倒县长施方白”的口号；崇明农民请愿并喊出“对折交租”的口号。此外，江阴农民协会为改进社会风气特派宣传员和调查员做禁烟禁赌的宣传。

农民政权的军事暴动力量尚弱，以农民为主体，成分单一，还未成军事体系，停留在反抗地主豪绅而不是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阶段。如皋农民协会公开办公，革命委员会设立大本营，指挥农民自卫军作战；丹阳县农协召集代表大会，讨论斗争计划，并提出农民斗争总要求；江阴组织农民自卫军。这些斗争的方式都未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

(2) 北伐失败后的江苏农民运动发展形势（1927年4月-1927年12月）

北伐失败后，中共开始转变农民暴动路线。瞿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对农民运动的斗争方向和目标作出阐释，即游击战争是暴动的初期现象，是武装

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之一，通过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进而建立革命根据地才是农民运动的出路。

岳威在《江苏农民大暴动之过去与将来》中总结了1927年11月的江苏农民运动形势。农民暴动的口号更加突出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宜兴农民群众喊出了“农民革命胜利万岁”，“没收地主土地”，“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并派宣传员向农民群众解释暴动的意义。江苏各地的暴动在中共组织下有纪律地发动，游击作战越来越富有经验，甚至出现了占领县城，建立县级苏维埃的局面。

《布尔塞维克》借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报刊言论实事求是地宣传农民斗争成果。典琦在《旬日以来南方之革命潮》中记载各日报报道江苏的农民运动情况，发现“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州市委员会之印刷品”，“崇明县革命军农工联合军总司令部之印”，江阴“黏贴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及布告，下署总司令高大鹏革命委员会宣传部等字样”。这是党报党刊党性原则的早期体现。^[4]

但这一阶段的农民斗争还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和执行土地革命，占领县城后急于占领城市，使得革命成果终被颠覆。

3.《布尔塞维克》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东江革命委员会在多地发动革命，希望建成工农割据局面，其中以海陆丰暴动影响最为深远。

(1) 海陆丰农民运动发展形势

海陆丰苏维埃作为中共领导成立的最早的农村苏维埃政权，虽然在广州暴动失败后遭到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联合打击，并走向失败，但其为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为开展土地革命与践行苏维埃割据树立了榜样。

①走向高潮的海陆丰农民运动（1927年4月—1927年11月）

大革命失败后的农民运动还停留在反抗地主剥削的阶段，海陆丰农民利用军阀冲突和纪念十月革命的时间节点发动武装暴动，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

海陆丰起义具备军事上的组织性。在暴动前农协就武装农民群众攻打农村反动势力；制定作战步骤为先区乡后县城；工农革命军第四团以协作力量加入暴动，充分发挥了农民群众自身的力量。从海陆丰出发，与碣石、捷城各处连接形成革命区域。

暴动成功后采取了一系列工作。首要的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县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甚至自耕农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再重新分配给自耕农和佃农，并由政府发放土地使用证给农民，打破了几千年“租从佃出”的

传统观念；焚烧了一切与地主、重利盘剥者的契约债务关系，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经济制度。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军事力量的加强。东江革命委员会组织各乡成立赤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以巩固苏维埃政权，肃清地主豪绅及反动势力。取消过去雇佣军队的方法，代以团体的义务兵役。海陆丰正式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遂组织全县代表大会，各区按照工农兵人数占比具体分配代表名额，各区农民代表由代表大会互选产生，工人兵士代表直接选举产生。代表大会使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

②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存蓄武装力量割据（1927年12月后）

广州暴动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海陆丰苏维埃为保存革命力量采取扩大暴动区域，做成割据局面的策略，将广州与东江、北江的武装力量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暴动起到鼓舞启发的作用。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共中央做出“由东江北江琼崖的割据局面，将汇合成全省总的暴动，夺取全省政权”^[5]的错误进攻指示，而不是保存并转移革命力量到敌人势力较为薄弱的湘赣边境，导致革命力量遭受打击。

(2)《布尔塞维克》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宣传鼓动作用

《布尔塞维克》详细地刊载了海陆丰起义的整个过程，罗浮《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东暴动前的准备》《海陆丰苏维埃的外交》以通信载体介绍海陆丰的情况。

第13期特出广州暴动特刊二，指出“海陆丰苏维埃的政权之丰富的材料。他的胜利，他的经验，应当充分的运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广东省委应当“公布这些暴动的一切材料和文件。立即散布关于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暴动及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中央及地方都应当在自己的机关报杂志传单宣言通告之中运用广州及海陆丰暴动的材料。”这种号召党内思想学习的动员作用，充分发挥了理论性党刊宣传思想、指导实践的功能。^[6]

4.《布尔塞维克》与湘赣农民运动

过去中共中央所设想的由游击战争发展武装斗争，由几县割据发展到几省割据，从而形成总暴动的局面。湘赣农民运动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4月仅形成了零星的政权割据，直到“朱毛”会师进军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湘赣作为中共农民运动的重要区域，群众斗争经验丰富。

(1) 马日事变前的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5月21日前）

马日事变前湖南农民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实行战时

社会主义的食粮分配方式。农民协会以省县区乡划分级别，并对各自区域内的食粮流通进行严格管理，如有跨级别的流通需有上一级的同意批准和护照；以乡为单位调查人口，农协通过分配食粮便可知食粮多少的情况；对于特别赤贫的贫农，农协会发放执照以最低价格售予贫农；以法令条例将粮食集中于农民协会之下，专办战时粮食供给，省农协具有最高执法权。

(2) 湘赣武装割据力量积蓄期(1927年10月-1928年4月)

从1927年10月开始毛泽东开展湘赣边界工作，逐步在宁冈、遂川、莲花、永新、茶陵等地区建立党组织，初步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1月，朱德率起义军开展湘南暴动，4月失败后，与毛泽东所率部队会合，湘赣农民运动是工农红军的起源，在暴动过程中由毛泽东朱德将正规军队与农军正式编队整合形成红军。

据《南昌暴动后的江西农民运动》载，自1927年9月至12月，江西各县农民群众斗争日趋激烈。典琦在《湘鄂赣川四省农民暴动之新发展》中汇总了关于湘赣的革命情况，其呈现出了以下特点：共产党占领县城后便组织劳农政府；不重占领县城而采取游击作战的形式巩固和扩大革命区域；重视军队力量的整合与利用，如湘东工农革命军在占领茶陵县城时，会合第二师与独立团共同作战；湘赣形成农村割据局面。

江西农民群众组织纪律严明，各级农协之执委都由农民担任，大小事务由农民自由发表意见，农协实际成为农村中的政治机关；中共的土地革命宣传增强农民的阶级意识；农民群众积极要求扩大新式武装。

湘南苏维埃没收土地后，交由乡苏维埃分配，得到土地的农民革命斗争日盛。醴陵苏维埃分配土地有两种方式，一是农民平均分耕土地，一是共同耕种，耕种由乡村耕作委员会指挥；扩大工农武装队伍，“组织有工农革命军，农民勇敢队，工人赤卫队，暴动队，少年先锋队，都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7]。

(3) 朱德、毛泽东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后)

192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发布第44号通告，提出要把“争取群众的工作，建立城市乡村的群众组织，以及巩固并健全党的组织”作为“最重要的工作”。^[8]

湘赣革命“从前不免躁进，现在是有计划的进攻；从前不免浮器，现在是力谋深入”。工农红军第四军集合各县赤卫军活动于赣西南，后自卫军游击队又由赣边境

进入湖南，湘赣方面已经呈现工农武装割据且割据区域逐渐扩大的局面。“红军不注重攻城，务求革命深入各地民众”，从根本的社会生产关系入手，尤其是注重贯彻落实土地革命。^[9]

湘赣农民运动多是转载国民党报道，《布尔塞维克》以言论整合报道，以共产党的政策理论指导实际工作。由于受到“左”的错误的的影响，中共的部分政策与湘赣实际的斗争情况不相符合，对革命力量造成了损伤。

此外，《布尔塞维克》还介绍《十月革命怎样解决了俄国的土地问题》，为党内解决土地问题提供经验。

四、总结

《布尔塞维克》刊载的农民运动篇幅众多，涉及地域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主要目的是团结农民群众于中共领导之下。按照地域可以划分为北方与南方农民运动，其中刊载的北方农民运动虽然落后且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在解放北方农民思想，号召北方农民参与阶级斗争方面，《布尔塞维克》起到了中共党刊的鼓动作用；其中刊载的南方农民运动过程详实，《布尔塞维克》起到了宣传土地革命、总结过去失败经验、指导开展工作的作用。按照时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北伐战争失败前土地革命宣传期；第二阶段为北伐失败后至1927年底土地革命深入期；第三阶段为1927年底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时期。

参考文献：

- [1]《布尔塞维克》[J].(影印本)
-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3]刘秉荣.中国工农红军全传(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4]刘秉荣.中国工农红军全传(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 [8]李曙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工农武装暴动思想述评[J].苏区研究,2021(4).
- [9]闻君宝,李江涛.土地革命初期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探索及当代价值[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